

# “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的增长收敛与发展前景

黄益平 王 勋 胡 炬

**摘要** 贸易摩擦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是学界和政府部门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通过实证检验贸易与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绩效和经济增长收敛的异质性影响,并采用开放经济体增长收敛模型,考察“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及增长收敛的决定因素,可发现:“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均GDP潜在增速将从5.5%逐渐下降到5.0%;由于老龄化导致人口增长逐渐由正转负,我国GDP潜在增速将从5.8%逐渐下降到5.0%。对外开放尤其是贸易开放是发展中国家成功向高收入经济体收敛的前提条件,城市化进程和人力资本积累会显著提高经济收敛能力,而人口老龄化将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我国要进一步开放和改革国内市场,积极采取措施应对老龄化冲击,发挥城市化和人力资本的“双引擎”作用,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中国经济;贸易开放;金融开放;增长收敛

**中图分类号** F061.2;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2)01-0091-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091)

“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基本面及未来增长的前景,是学界和政府部门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鉴于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其他地缘政治因素增加了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21年10月下调了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5.9%。中国近几年“去杠杆”和强监管的政策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内经济的下行压力,人口老龄化加快将不断增加养老、社保压力并影响经济转型。这些因素均引起了外界对中国未来经济政策走向的关注,以及对经济短期走势和长期趋势的担忧。因此,系统研究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和影响我国经济向高收入经济体收敛的决定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尽管近年来已有不少关于增长前景估计的研究,然而鲜有研究深入分析经济收敛的决定因素及其对潜在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和事实均表明<sup>[1](P11-23)</sup><sup>[2]</sup>,开放经济体的人均实际收入具有相对收敛的规律,也就是说,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开放经济体表现出相似的生产率收敛特征。具体而言,开放经济体初始的相对人均收入越低,之后的人均收入平均增长率越高。然而,人口因素并没有表现出类似的规律。因此,在预测潜在增长率的过程中,需要同时考虑相对收敛的规律以及不同国家人口结构的独特特征。

本文主要关注开放经济体人均GDP及其增长率收敛的动态演变,以及决定开放经济体对外部知识和先进技术接受转化能力的基本因素。本文从以下两方面拓展了相关文献:第一,我们将贸易开放数据库和金融开放数据库相匹配,在经典经济增长实证分析基础上,分析了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对增长收敛的影响;第二,我们在开放经济体追赶模型的基础上,利用非线性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了中国增长前景和相对人均GDP的收敛情况,提出了估计潜在增长率的一种新框架。

### 一、“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测算方法

关于长期增长预测,已有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不尽相同。根据经典经济学理论,短期内由于存在价格粘性,工资和价格调整相对缓慢,短期均衡取决于总需求和向右上方倾斜的短期总供给,未预期到的通胀具有实际效果。而长期内工资和价格可以灵活调整,预期通胀与实际通胀相等,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在自然失业率决定的潜在产出水平上的垂线,均衡的产出水平取决于充分就业的潜在产出水平。此时,需求冲击只会改变长期均衡时的通胀水平,而不会有实际效果。可见,在长期中,预测的潜在产出是长期总供给曲线决定的充分就业的潜在产出,而基于需求侧的长期增长预测,容易忽视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

关注供给侧的长期增长预测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增长核算法。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采用增长核算法对我国经济潜在增速进行了测算<sup>[3][4][5]</sup>。增长核算法的优点在于利用了经济增长的供给侧特征,但局限性在于预测结果取决于生产函数设定以及要素产出弹性,这些因素的确定在学术界尚无统一结论。

第二,结构模型法。一些大型机构采用了基于经济理论的大型结构模型预测我国经济增长。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发展”课题组和世界银行使用了CGE模型<sup>[6][7][8][9]</sup>(P4-25),IMF采用了DSGE模型<sup>[10]</sup>(P1-20)。这些方法同时考虑了需求和供给面的因素,适合于分析经济波动,在预测短期经济增长时更为有效,不适合长期潜在增长率的预测。

第三,基于增长收敛理论的简单类比法。这种方法简单地假定,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应该大致相同<sup>[11][12]</sup>。但是,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没有考虑到各个国家不同的制度环境和人口特征。

本文将基于开放条件下增长收敛理论框架,结合我国人口结构的特征变化,预测我国的长期潜在增长率。根据增长收敛理论,开放经济体的人均实际GDP表现为相似的收敛特征。具体而言,采取开放政策的追赶经济体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取决于三个因素:领先经济体人均实际GDP的增长率,领先经济体与追赶经济体的相对人均实际GDP,以及技术溢出参数。

开放经济体由低收入向高收入的收敛规律,可用少数参数进行刻画,且具有显著的拟合效果。Lucas提出了一个具有技术溢出的追赶增长模型。假定世界上有两类经济体:领先经济体和采取开放政策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人均产出与其知识存量成比例。领先经济体知识存量的变化路径如下:

$$K'(t) = \mu K(t) \tag{1}$$

其中 $K(t)$ 为领先经济体的知识存量, $K'(t)$ 为领先经济体知识存量随时间的变化率,那么 $\mu$ 为领先经济体知识存量的增长率。处于追赶中的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存量变化既取决于自身的知识存量,也取决于开放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吸收发达国家的知识溢出的能力。因此,发展中国家知识存量的变化率为:

$$k'(t) = \mu k(t)^{1-\theta} K(t)^\theta \tag{2}$$

其中, $k(t)$ 表示发展中国家知识存量随时间的变化率, $\theta$ 为发展中国家的收敛效应,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吸收领先经济体知识溢出、技术转移进而进行自主创新的能力。如果发展中国家采取封闭政策,则此时 $\theta = 0$ ,而如果采取开放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成功追赶,则 $\theta = 1$ ,说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存量收敛到了领先经济体的水平。可见,连接发展中国家和领先经济体的渠道是双向对外开放。只有对外开放,发展中国家才有可能走上经济收敛的道路。由于假设知识存量与人均收入成比例变化,因此,领先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处于均衡增长路径,增长率为 $\mu$ 。

采取开放政策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率满足:

$$\mu \left( \frac{K}{k} \right)^\theta \quad (3)$$

由于  $K > k$ , 采取开放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增长快于领先经济体, 其增长率取决于相对的人均 GDP 和收敛率  $\theta$ 。按照习惯的做法, 假设美国为领先经济体, 人均 GDP 低于美国的为追赶经济体, 因此追赶经济体  $i$  的人均 GDP 增长的动态变化为:

$$g_{y,i,t} = \mu \left( \frac{y_{us,t-1}}{y_{i,t-1}} \right)^\theta \quad (4)$$

其中,  $y_{i,t}$  表示经济体  $i$  在  $t$  年以 2011 年国际元衡量、以美元标价的人均 GDP,  $g_y$  为人均 GDP 的增长率, 经济体  $i$  在  $t$  年的相对人均 GDP 为该经济体在  $t$  年的人均 GDP 与美国在  $t$  年人均 GDP 的比值。

为测算我国“十四五”时期人均 GDP 的增长率, 需要确定反映领先经济体处于稳态的人均 GDP 增长率和知识技术溢出参数。第一, 以 2018 年我国相对美国的人均 GDP 为标准, 识别与当前我国处在相同发展水平的可比开放经济体。例如, 根据麦迪逊数据库, 2018 年我国相对于美国的人均 GDP 为 23.7%, 基本上等价于日本 1953 年与美国的相对人均 GDP (23.3%)。第二, 基于开放经济体的历史数据, 利用非线性回归估计技术溢出与自主创新能力参数。第三, 根据估计得到的知识技术溢出参数, 设定不同情形下美国人均 GDP 增长率, 结合我国初始的相对人均 GDP (2018 年), 得到 2021-2025 年我国人均 GDP 及其增长率的测算值。

## 二、“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本文使用的人均实际 GDP (以 2011 年国际元衡量, 以美元计价) 及其增速的历史数据来自最新发布的麦迪逊数据库 (2020 版)。人口增速及 2020-2035 年人口增速预测的数据来自联合国 2019 年世界人口展望数据库 (WPP2019)。

由于麦迪逊数据库 (2020 版) 更新到 2018 年, 所以我们设定 2018 年为测算我国潜在人均增长率的初始年份, 2019-2035 年为预测区间。首先根据已有文献关于贸易开放经济体的界定和我国 2018 年相对人均 GDP 数据, 我们从 113 个经济体中识别了 5 个与我国处在同等发展水平的开放可比经济体, 分别是日本 (1953 年)、新加坡 (1969 年)、中国香港 (1953 年)、中国台湾 (1977 年) 和韩国 (1982 年)。表 1 给出了根据麦迪逊数据库 (2020 年版) 识别出的开放可比经济体的具体信息。

表 1 我国可比的开放经济体

经济体	年份	相对人均 GDP
中国	2018	0.237
日本	1953	0.233
新加坡	1969	0.245
中国香港	1953	0.239
中国台湾	1977	0.238
韩国	1982	0.233

注: 数据来源于麦迪逊数据库 (Maddison 2020); 我国的数据未统计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数据。

### (一) “十四五”时期不同情形下中国人均 GDP 潜在增长率

以第一部分模型中 (4) 式为基础, 利用美国和中国可比开放经济体的历史数据, 采用非线性回归拟合法, 得到技术溢出与自我创新的参数  $\theta$  为 0.8。考虑到中美经贸及技术领域摩擦, 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美国对我国将形成长期限限制态势, 国际技术合作与交流将明显低于过去三、四十年的水平。因此, 本文也将考虑存在技术摩擦的情形, 即下调技术溢出与自我创新参数 0.5-0.75 个百分点。在进行预测时, 美

国稳态的人均GDP可以根据美国历史数据直接设定,以作为不同情形分析的基础。本文选取两个代表性阶段:二战后到最近(1961-2018年),美国人均GDP平均增速为2.00%;近五年(2014-2019年),美国人均GDP平均增速为1.8%。因此,本报告设定三种情形进行分析:高增长、高溢出(美国人均GDP增长率为2%,溢出指数为0.8);高增长、低溢出(美国人均GDP增长率为2%,溢出指数为0.75)和低增长、低溢出(美国人均GDP增长率为1.8%,溢出指数为0.75)。

在给定美国稳态人均GDP增长率和开放条件下技术溢出与自我创新参数的情况下,结合麦迪逊数据库中2018年中美人均GDP的初始值,可以测算到2035年不同情形下我国人均GDP的增长率。表2报告了2021-2025年间我国人均GDP的潜在增长率。结果显示,在高增长、高溢出的高情形下,我国的人均GDP增长率将从2021年的6.0%逐渐下降为2025年的5.3%;中等情形下,我国的人均GDP增长率将从2021年的5.6%逐渐下降为2025年的5.1%;低情形下,我国人均GDP增长率将从2021年的5.0%逐渐下降为2025年的4.6%。

表2 中国潜在人均GDP增长率:2021-2025年(%)

情形	高情形	中情形	低情形
	高增长、高溢出	高增长、低溢出	低增长、低溢出
2021	6.0	5.6	5.0
2022	5.8	5.4	4.9
2023	5.6	5.3	4.8
2024	5.5	5.2	4.7
2025	5.3	5.1	4.6

注:数据来源于麦迪逊数据库(Maddison 2020)。

## (二)“十四五”时期不同情形下中国GDP潜在增长率

GDP潜在增长率可以分解为人均GDP增长率和总人口增长率之和。本研究的人口的预测数据来自联合国人口展望数据库。考虑到目前我国适龄人口的低生育意愿,我们以低生育率下的人口总量作为“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口增长率的测算依据。可以确定的是,老龄化导致的总人口下降,将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挑战。

通过加总人均GDP潜在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可以得到不同情形下我国未来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预测。表3的结果显示,在高情形下,我国潜在GDP增长率将从2021年的6.2%逐渐下降至2025年的5.3%;在中情形下,我国潜在GDP增长率将从2021年的5.8%逐渐下降至2025年的5.1%;在低情形下,我国潜在GDP增长率将从2021年的5.3%逐渐下降为2025年的4.6%。

表3 中国GDP潜在增长率:2021-2025年(%)

情形	高情形	中情形	低情形
	高增长、高溢出	高增长、低溢出	低增长、低溢出
2021	6.2	5.8	5.3
2022	6.0	5.6	5.1
2023	5.7	5.4	4.9
2024	5.5	5.2	4.8
2025	5.3	5.1	4.6

注:数据来源于麦迪逊数据库(Maddison 2020)。

## 三、继续扩大开放对中国经济绩效的重要意义

对外开放是发展中国家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的前提条件。诸多研究表明,对外贸易和吸收投资

的增长对提升国内就业<sup>[13]</sup>(P212-268)、工资水平<sup>[14]</sup>(P1695-1725)、要素再配置的效率<sup>[15]</sup>(P1-20)以及技术升级<sup>[16]</sup>(P87-117)有显著效果。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起步和腾飞,离不开在积极参与全球贸易投资分工体系中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而在贸易与投资过程中,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和知识溢出直接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与收敛能力,进而有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中经济增长的效率。

### (一) 开放经济体的经济表现与收敛特征

为直观检验开放政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我们借鉴 Sachs-Warner 分类标准<sup>[17]</sup>(P1-95),根据贸易及相关政策将 1980-2010 年间 113 个经济体分为开放经济体和封闭经济体。值得注意的是,1978 年后我国实施了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经济政策,特别是 2001 年加入 WTO 后,我国逐渐成为国际市场上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国。鉴于此,我们将这一阶段也视作开放状态。

图 1 清晰地展示了开放经济体和封闭经济体的增长绩效。横轴是 1980 年的人均 GDP(以 2011 年的国际元衡量,以美元计价),纵轴是 1980-2010 年间人均 GDP 的平均增长率。可以发现,开放经济体基本上分布在右上方边缘。这表明,在多数情况下,初始阶段发展水平相当而在随后 30 年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经济体,其经济增速显著高于采取封闭政策的经济体。我国在此期间的经济绩效更加显著。根据 Maddison 2018 的数据,我国 1980 年人均 GDP 为 1539 美元,随后 30 年间,我国人均 GDP 年均增长长达 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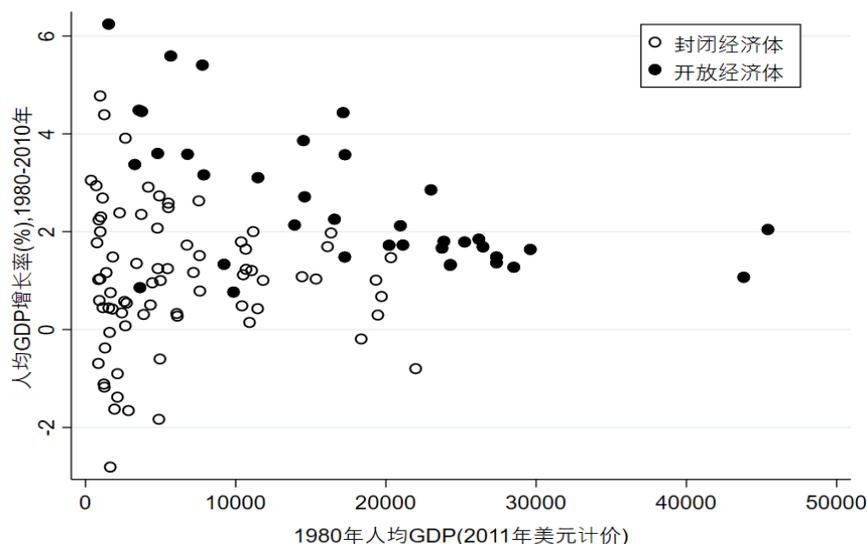


图 1 113 个经济体的人均 GDP 与增长率

注:数据来源于麦迪逊数据库(Maddison 2020);本图由作者绘制。

进一步来看,成功实现跨越的高收入国家的历史数据展现出非常明显的增长收敛特征,即初始阶段人均收入水平越低的开放经济体,由于起点相对较低,随后的经济增长速度越高。为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选择了 5 个亚洲开放经济体(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和 14 个欧洲开放经济体(爱尔兰、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瑞士、英国和西班牙),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描述了 1960 年的初始发展水平与随后 50 年经济增速的关系,发现增长收敛的特征仍然显著(如图 2)。

图 2 显示了与上图相似的经济收敛的特征事实。在开放政策等条件下,低收入的经济体会逐渐向高收入经济体收敛。1960 年人均 GDP 越低的经济体,在随后 50 年的开放发展中,按人均 GDP 衡量的经济增速越高。向右下方倾斜曲线也表明,存在使得开放经济体之间的人均收入和增长率相互收敛与趋同的内在经济力量和机制。

1978年后,我国经济体系开始逐渐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而20世纪5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基本上采取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并对西方国家采取了相对封闭的政策。由于市场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计划体制下虽经济体系得以建立,但其中资源配置扭曲导致经济效率低下,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不断上升。图3展示了改革开放前后中美人均GDP(取对数)的差距变化情况:1950-1978年间,我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约3%,与美国人均GDP增速没有明显差别。然而,改革开放后至2014年,我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速超过6%。尤其是2000年后,我国人均GDP与美国的差距呈现加快缩小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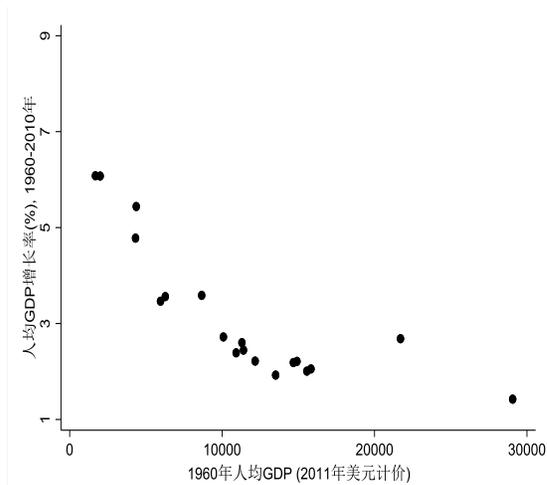


图2 19个高收入经济体开放经济体的收敛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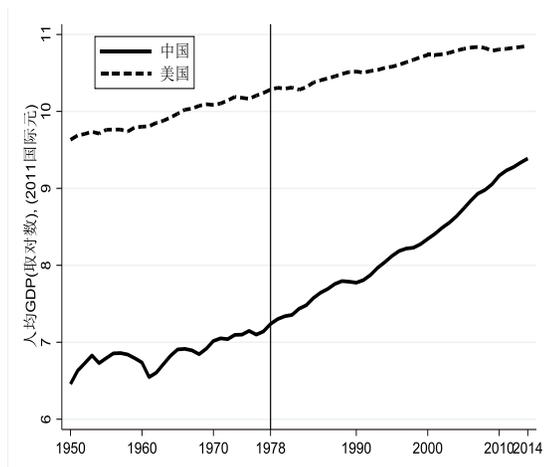


图3 中美人均GDP(取对数), 1950-2014年

注:图2、图3数据来源于麦迪逊数据库(Maddison 2020);本图由作者绘制。

### (二) 增长收敛回归

为更加规范地检验开放的重要性,以及何种形式的开放对增长收敛更有效果,在经典增长理论的实证研究基础上<sup>[18]</sup>(P407-441)<sup>[19]</sup>(P223-251)<sup>[20]</sup>(P1-26),我们设定如下增长收敛模型:

$$GR8010_i = \alpha GDPPC80_i + \beta OPEN80_i + \gamma OPEN80_i \times GDPPC80_i + \Pi X_i + \epsilon_i$$

其中 $GR8010_i$ 为经济体*i*在1980-2010年的30年间的人均实际GDP平均增速。 $GDPPC80_i$ 为经济体*i*在1980年的人均GDP,表示各经济体初始的人均收入水平; $OPEN80_i$ 经济体*i*在1980年实施的贸易或金融开放政策,1表示开放,0表示封闭。Trade Open\_1980表示经济体1980年实施的贸易政策,CA Open\_1980表示经济体1980年实施的金融开放政策。交互项 $OPEN80_i \times GDPPC80_i$ 衡量了开放经济体的增长收敛性; $X_i$ 表示影响长期经济平均增长的其他控制变量,如初始的中小学入学率、以政府消费占GDP比例衡量的政府规模、以资本品价格与各国平均水平的偏差表示的价格扭曲程度、以政治稳定性表示的制度环境等。其中人均GDP、人均GDP增长率、中小学入学率、政府消费占GDP比例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贸易开放政策来自Sachs和Warner,金融开放政策来自Chinn-Ito的KAOPEN指数<sup>[21]</sup>,政治稳定性来自世界银行政府治理数据库。

表4报告了增长收敛模型的基本回归结果。前三列分别引入了初始人均实际GDP的增长率,初始贸易开放状态以及初始人均实际GDP和初始贸易开放状态的交互项。第(3)列结果显示,初始贸易开放状态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采取贸易开放政策的经济体,随后30年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要显著高于采取贸易封闭政策的经济体;初始人均实际GDP和初始贸易开放状态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开放经济体表现出增长收敛的特征,即初始的人均GDP越低,随后的人均GDP增长率越高。第(4)列加入了初始的资本项目开放状态及其与初始人均实际GDP的交互项,以考察金融开放是否会显著影响经济体的增长绩效和增长收敛。结果显示,这两项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

表4 增长收敛回归：开放对增长绩效重要性

变量	GR8010			
	(1)	(2)	(3)	(4)
GDPPC80	-0.936*** (0.339)	-1.062*** (0.283)	-0.378 (0.375)	-0.387 (0.466)
Trade Open_1980		1.623*** (0.491)	16.242*** (3.987)	16.065*** (3.913)
Trade Open_1980×GDPPC80			-1.611*** (0.436)	-1.590*** (0.427)
CA Open_1980				0.692 (4.019)
CA Open_1980×GDPPC80				-0.072 (0.460)
小学入学率(1980年)	0.009 (0.010)	0.011 (0.010)	-0.005 (0.010)	-0.005 (0.012)
中学入学率(1980年)	0.034*** (0.010)	0.024*** (0.009)	0.031*** (0.007)	0.032*** (0.008)
政府规模	-0.059 (0.047)	-0.071 (0.045)	-0.077** (0.033)	-0.076** (0.034)
资本品价格偏差	-0.582** (0.225)	-0.399** (0.196)	-0.299* (0.178)	-0.277 (0.191)
政府稳定性	0.904*** (0.222)	0.564*** (0.204)	0.444** (0.191)	0.416* (0.236)
观测值	67	67	67	66
R <sup>2</sup>	0.374	0.474	0.593	0.590
与贸易封闭经济体相比,贸易开放经济体的经济绩效	-	1.623***	2.207***	2.213***

注：被解释变量：67个经济体1980-2010年间平均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控制变量：GDPPC80(取对数的初始人均实际GDP)；Trade Open\_1980(初始的贸易开放状态)，开放为1，封闭为0；CA Open\_1980(初始的资本项目开放状态)，开放为1，封闭为0；反映初始人力资本水平的小学入学率和中学入学率；政府规模；反映价格扭曲程度的资本品价格偏差；反映制度环境的政府稳定性。“\*\*\*”“\*\*”“\*”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以上实证分析表明，相对于金融开放，贸易开放是经济体增长绩效和增长收敛更为显著的影响因素。以第(4)列为例，与贸易封闭经济体相比，贸易开放使得开放经济体的人均实际GDP的增长率比采取封闭政策的经济体平均高出2.2个百分点。

#### 四、影响中国“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长绩效的重要因素

已有研究已经识别了一些经济从贫穷向富裕收敛的相关因素。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和城市化率的提高会显著提升追随经济体吸收来自领先经济体的知识溢出、接受技术转移从而提升自身自主创新的能力。少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估计参数显著为负，说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这两个比例上升会降低追随经济体吸收和掌握来自领先经济体知识和技术的能力。

除了人口结构，人力资本和城市化进程是人们讨论最多的两个因素。尽管人力资本和城市化之间是相关的，但是二者之间有明确的不同含义。人力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衡量的是经济体中劳动力的质量，如劳动力的知识储备、生产技能和管理经验等，而城市化进程衡量的是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信息和知识的聚集效应。

人力资本通常用相应的受教育年限来衡量<sup>[22]</sup>(P32-52)。对于追赶经济体而言，人力资本越多，接受

技术转移所需要的交流能力就越强,吸收适宜技术进而研发创新所需要的知识存量就越多。经验表明,城市是信息和知识的交流中心以及技术资金的流入中心。除了国内劳动力转移的其他障碍之外(如我国的户口制度),需要必要的人力资本积累才能使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长期稳定下来。

因此,城市人口的集中和劳动力的质量,对于采取开放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实现顺利追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现实情况下,大部分人口或就业通常分布在农村地区,而农业又属于低技术部门,大量人口从事农业生产阻碍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以我国为例,改革开放之初,82%的人口聚集在农村,当时我国的人力资本仅为美国的49.3%、日本的55%。发展中国家采取对外开放政策后,城市就逐渐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外部先进知识和技术的中心。在此过程中,教育体系的改善将有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图4和图5分别用113个经济体的数据展示了城市化与取对数的人均GDP,以及人力资本与取对数的人均GDP的关系。这两幅图表明,高收入经济体均具有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和城市化率,然而低收入经济体则相反,面临较低的人力资本和城市化率。201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和人力资本在样本数据中处于中等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我国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政策下,未来实现高质量增长的潜力仍然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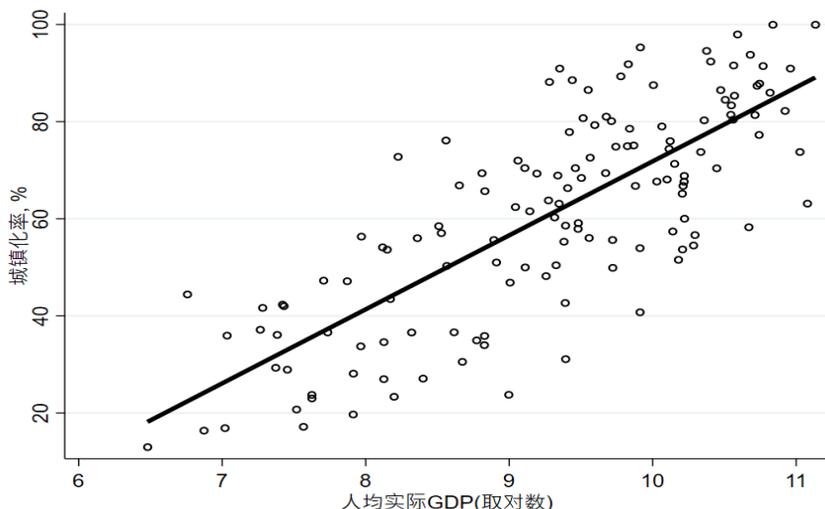


图4 2018年城镇化与人均GDP(取对数)的关系

注:数据来源于麦迪逊数据库(Maddison 2020)、Penn World Table(PWT 9.0)、WDI;本图由作者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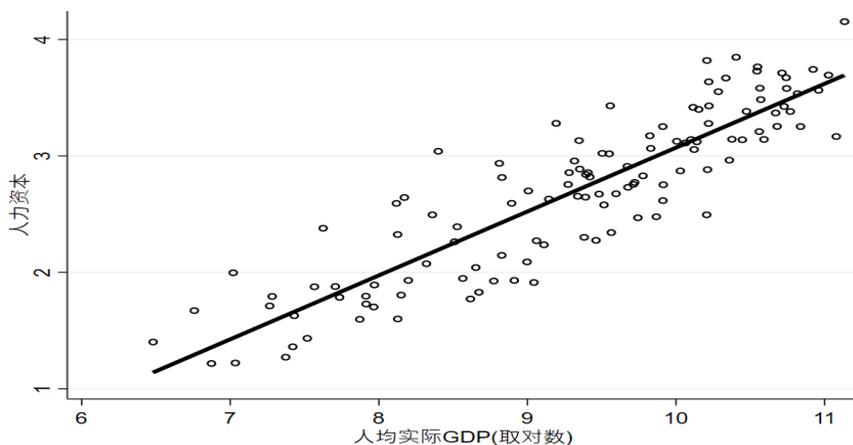


图5 人力资本与人均GDP(2018年)

注:数据来源于麦迪逊数据库(Maddison 2020)、Penn World Table(PWT 9.0);本图由作者绘制。

##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估计方法是利用开放经济体的增长收敛理论估计我国“十四五”时期人均GDP增长率,并结合根据我国人口结构特征预测的人口增长数据,测算这一时期我国的GDP潜在增长率。根据模型预测,高情形下,我国潜在GDP增长率将从6.2%逐渐下降至5.3%;中情形下,潜在GDP增长率将从5.8%逐渐下降至5.1%;低情形下,潜在GDP增长率将从5.3%逐渐下降为4.6%。

本文阐述了对外开放对发展中国家实现成功追赶的重要意义。增长的理论 and 经验均表明,对外开放是发展中国家成功缩短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前提条件。开放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和开展对外合作交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接触领先经济体先进知识、技术转移和溢出的机会,并有利于提升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这些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至关重要。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也应加强自身知识产权保护,积极营造有利于鼓励创新和技术转移的制度环境。此外,城市化进程、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于提高追随经济体赶超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我们认为,本文的分析和结果,特别是对于中国和其他采取开放政策的转型经济体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

首先,进一步开放和改革国内市场,对于未来几十年中国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顺利步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至关重要。由于中国的市场结构和制度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别,中国在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和对外开展业务的过程中,更应利用和遵守国际市场规则和实践。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更要加强知识产权和私有产权保护,积极营造有利于鼓励创新和技术转移的制度环境。

第二,人口老龄化将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增长的挑战和制约因素,应积极采取措施应对老龄化冲击。中国的老龄化人口已经开始增长。联合国的预测数据显示,在中等生育率情形下,中国总人口将从2030年开始下降。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中国的养老体系和社保体系的压力和负担将不断增加,同时,也会阻碍人力资源的积累。考虑到当前下降的总和生育率和较低的生育意愿,应适时考虑全面取消生育控制政策,并结合实际研究给予二孩及以上家庭适当补贴。

第三,城市化和人力资本可成为推进高质量对外开放进程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双引擎”。建议以“都市圈”发展为突破口加快城市化进程,充分发挥“都市圈”作为信息和知识汇集中心的引领作用和新时期高质量发展的带动作用。“十四五”时期应注重释放核心城市的辐射功能,形成核心城市带动、周边小城市和小城镇联动的良性都市圈发展局面。人力资本的增长和聚集,离不开城市化进程中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基础设施的完善。在加大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投入、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中国也应注重消除人口转移和流动的成本与障碍,促进教育及其他资源的合理流动以及跨地区的配置效率,为提升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动力提供智力支持与基础保障。

### 参考文献

- [1] S.L. Parente, E.C. Prescott. *Barriers to Riches*. Cambridge: MIT Press, 2000.
- [2] R.E. Lucas. Trade and the Diffusion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09,(1).
- [3]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路径、效率与潜在增长水平. *经济研究*, 2012, (11).
- [4]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中国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冲击与减速治理. *经济研究*, 2014, (12).
- [5]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突破经济增长减速的新要素供给理论、体制与政策选择. *经济研究*, 2015, (11).
- [6] 刘世锦. 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5-2024): 攀登效率高地.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
- [7] 刘世锦, 刘培林, 何建武. 我国未来生产率提升潜力与经济增长前景. *管理世界*, 2015, (3).
- [8]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博智宏观论坛”中长期发展课题组. 2035: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结构与路径. *管理世界*, 2018, (7).
- [9] World Bank. *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Society (English)*.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3.
- [10]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7.

- [11] 林毅夫. 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 金融时报, 2014-03-06.
- [12] 张军. 中国经济的“非常态”. 金融时报, 2015-03-18.
- [13] D. Autor, D. Dorn, G. Hanson.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6).
- [14] M. Melitz,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Productivity Growth. *Econometrica*, 2003, 71(6).
- [15] M. Melitz., S. Redding. Firm Heterogeneity and Aggregate Welfare. NBER Working Paper NO.18919, 2013.
- [16] N. Bloom, M. Draca, J. Van Reenen. Trade Induced Technical Change? The Impact of Chinese Imports on Innovation, IT and Productivity.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6, (83).
- [17] J.D. Sachs, A.M. Warner.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Process of Global Integration.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95, (1).
- [18] R.J. Barro. 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 *Quarter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 (106).
- [19] R.J. Barro, X. Sala-i-Martin. Converg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2, 100(2).
- [20] R.J. Barro, X. Sala-i-Martin.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Convergence, and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997, 2 (1).
- [21] M.Chinn, H.Ito. What Matters for Financial Development? Capital Controls, Institutions, and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6, (81).
- [22] Y. Wang, Y. Yao. Sources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1952-1999: Incorporating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3, (14).

## Growth Convergence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China's Economy in the 14<sup>th</sup> FYP

Huang Yiping, Wang Xun, Hu Ju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rade frictions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China's economy in the context of aging population are important issues of major concerns among the academia and policy maker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trade openness and financial openness on growth convergence, and investigates the growth prospects of Chinese economy in the 14<sup>th</sup> FYP period by employing a catch up model with technology spillovers. Projections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show that during 2021-2025 per capita GDP growth of China will drop gradually from 5.5% to 5.0%, and potential GDP growth will gradually decrease from 5.8% to 5.0% due to the aging population which leads to a negativ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Moreover, we find that trade openness, rather than financial openness is a precondition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have a successful convergence of high-income economies. While aging population is becoming a major challeng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urbanization will promote the ability of economic convergence for China. China will further open and reform internal markets, take active measures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aging population, and make good use of urbanization and human capital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conomy.

**Key words** Chinese economy; trade openness; financial openness; growth convergence

■ 收稿日期 2021-11-11

■ 作者简介 黄益平, 经济学博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871;

王 勋(通讯作者), 经济学博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胡 炬, 经济学博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助理教授。

■ 责任编辑 杨 敏